

百越论丛

BAIYUE LUN CONG ◆ 第一辑 ◆ 2008.6 ◆

主编: 袁鼎生

- ◆ 学术素质的超循环结构
- ◆ 传统文论的鉴赏式批评与今天的文学研究
- ◆ 侗族时空观与世界图式梳理
- ◆ 传播学理论的运用对唐宋词研究的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越论丛第1辑 / 袁鼎生 主编.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219-06317-0

I. 百… II. 袁… III. 百越 - 民族历史 - 中国 - 文集

IV. K2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7004 号

责任编辑 张 平

出 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桂春路 6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宁市社会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9-06317-0/K·1193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奇石碑记

福寿紫砚石形成于远古陆海边缘沉积地带，深藏于五岭山脉峡谷溪涧，岩龄已达10-16亿年，与闻名遐迩的子袍玉带石并称为稀世奇石珍品。

立为“广西民族大学更名纪念柱”的福寿紫砚石为纯天然扁柱状巨型石，高5.6米，宽1.8米，厚1.1米，重约30吨。石质坚硬细密，色泽圆润斑斓。玉呈彩饰，宛若祥云萦绕，蟠龙吐瑞，墨凝丹霞，恰似画幅舒展，大美天然。得此奇石，紫气东来，鸿运久远，文泽万载，基业永固！

容本镇 袁鼎生
公元2006年5月18日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的大型学术会议



在创新超越中进步

——卷首语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百越论丛》和大家见面了。

中古以前,广西为百越繁衍生息之地,地处中原与华南、西南文化的交汇之所,历经日久年深的磨砺、交流与融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又兼容并蓄的灿烂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开创与传承建立了非凡的历史功绩。由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创设和主办的《百越论丛》,正是旨在秉承百越气派之传统、彰显地缘之特色,追求海纳百川、兼容百家之风范,通过本辑话题、理论原点、学术高原、多元话语、地缘视野、学林争锋、语言论谭、新著评介等特色栏目的设置和内容,与天下学人携手并肩,共同营建一个坚持科学理性和追寻学术自由的理论空间和学术园地。

本辑话题围绕“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创新”这一论域,刊发了系列专题文章:张稔穰《全球文化整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全球文化整合的语境下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张再林《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研究刍议——以宋代士风与词史流程为例》提出加强对中国古代士风研究的重要意义;陆凌霄《从汤式散曲看元末明初下层士人的思想和生活》探讨元末明初下层士人的生活状况及心路历程;关四平《唐代婚恋小说超越生死模式新论——兼论唐代小说的研究方法》总结了唐代婚恋题材小说的两种模式,在研究方法创新与研究实践方面均提出了有价值的思考。

理论原点是我们要重点打造的学术品牌栏目,旨在呼唤与构建一种视野开阔、理论品格厚重、科学理性精神自觉而独到的理论话语。本期推出袁鼎生《学术素质的超循环结构》指出完整的学术素质,从元点性的系统发育—元学术潜构层次,走向学术本能—学术素养层次,再经由学术潜能—学术能力层次,抵达学术潜质—学术品质层次,最后形成系统发育加个体发育—学术潜构层次,以展开新一轮的良性循环,以推进了学术素质的生态发展,相应地促进学术目标的递次实现。

学术高原旨在彰显坚持创新性思维的学者的自觉、自信、自我反思与批判的意识。本辑推出王立《季羨林教授与主题学研究方法》就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论述季羨林先生在主题学方法与实践方面的成功运用;胡大雷《传统文论的鉴赏式批评与今天的文学研究》对“今天我们怎样进行古代文学研

究”提出了富有启示性的思考。

多元话语和学林争锋是两个风格各异又具有开放意识的栏目。樊星《恋母情结还是尊母心态——漫谈当代男性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尊母心态”对当代部分男作家谱写的母亲之歌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马明奎、杨迎平、张志忠、李启军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关注文化冲突和文化变迁。

特色栏目地缘视野奉献给读者的是巫瑞书、张泽忠、翟鹏玉、王志清、崔志清等学者的5篇文章,多角度地论述形成于特定气候、地理、历史环境中的各民族文学与文化生命有机体内最隐秘的特性,展现了在民族生态、美学理论、历史和应用多层研究、多元文化互纳共生研究等方面的可喜收获。

长期以来,潜心于岭南百越民族文化研究的学人们,坚持学科研究的地缘性、民族性和现代性追求,在民族濒危语言个案研究、壮侗苗瑶语族与东南亚相关民族文化研究方面成果斐然。本辑的语言论谭推出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贺大卫《东兰壮族的〈造天地经〉》从古籍整理的角度讨论壮族富有特色的经诗,解释其中某些语言文化事相和探讨相关的神话问题,以期引起学界重视壮族的语言和神话。黎曙光《对越汉语疑问句教学难点剖析》、蒙元耀《壮语物量词的指代用法》、周翔《浅析阿美语数词的文化特征》,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语言文化研究提供了新鲜观点。

在新著评介中,我们推荐李俊峰的《伟大的学术抱负〈生态艺术哲学〉评介》、吴周文的《评徐治平专著〈天涯芳草〉》以飨读者。

超越是一种进步,是一种提升。《百越论丛》从民族文化土壤中萌生,愿与普天下学人共同建构一个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具有学理性亲缘关系的理论研究空间,愿和大家携起手来,在学术“公共辩论空间”里,一起讨论人类文化发展的科学规律,共同追寻理性和自由之真谛。

种子经受蜕变阵痛后才冒出新芽;创新、超越和进步,当然少不了经受艰辛的磨砺。我们相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和付出,《百越论丛》在希望的季节里播种,可期待的必将是丰收和喜悦。

2008年5月20日

目 录

卷首语

在创新超越中进步

本辑话题

- 1 张稔穰:全球文化整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 4 张再林: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研究刍议
——以宋代士风与词史流程为例
- 9 陆凌霄:从汤式散曲看元末明初下层士人的思想和生活
- 14 关四平:唐代婚恋小说超越生死模式新论
——兼论唐代小说的研究方法

理论原点

22 袁鼎生:学术素质的超循环结构

学术高原

- 29 王 立:季羨林先生的主题学方法与实践
- 35 胡大雷:传统文论的鉴赏式批评与今天的文学研究

多元话语

- 39 樊 星:恋母情结还是尊母心态
——漫谈当代男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
- 42 杨迎平:巴金的《复仇》及《现代·书评》
——兼谈巴金与施蛰存的文艺观
- 47 马明奎:割裂和异化:现代人的存在状态
——阿库乌雾神异世界和诡异思维释读之二
- 51 张志忠:阅读者—思想者系列形象的凸现
——什么是中国经验中国思想

54 李京潞: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之辩证观

地缘视野

- 59 巫瑞书:越楚同俗探讨
- 65 张泽忠、胡宝华、吴鹏毅:澄明与敞开:侗族时空观与世界图式梳理
- 70 王志清:“借名制”——民间信仰在当代的生存策略
——烟台营子村关帝庙诞生的民族志
- 75 翟鹏玉:花神信仰与壮族社会性别实践范式
- 80 崔志强:对儿童游戏“跑花姑子”发生变迁的民俗学思考

学林争锋

82 杨 雨:传播学理论的运用对唐宋词研究的意义

语言论谭

- 86 黎曙光:对越汉语疑问句教学难点剖析
- 90 贺大卫:东兰壮族的《造天地经》
- 101 蒙元耀:壮语物量词的指代用法
- 105 周 翔:浅析阿美语数词的文化特征

新著评介

- 108 李俊锋:伟大的学术抱负:《生态艺术哲学》评介
- 112 吴周文:评徐治平专著《天涯芳草》

《百越论丛》编委会

主 任:容本镇
副 主 任:袁鼎生
委 员:韦树关 冯仲平 李启军
陆卓宁 陈金文 张泽忠
张晓勤 黄秉生 黄晓娟
蒙元耀

学术顾问:刘魁立 杨 义 周来祥
饶芈子 贺祥麟 袁世硕
童庆炳 戴庆夏
主 编:袁鼎生
执行主编:陆卓宁 黄晓娟
执行编辑:吕瑞荣 蓝芝同 马卫华

目 录

卷首语

在创新超越中进步

本辑话题

- 1 张稔穰:全球文化整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4 张再林: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研究刍议
——以宋代士风与词史流程为例
9 陆凌霄:从汤式散曲看元末明初下层士人的思想和生活
14 关四平:唐代婚恋小说超越生死模式新论
——兼论唐代小说的研究方法

理论原点

22 袁鼎生:学术素质的超循环结构

学术高原

- 29 王 立:季羨林先生的主题学方法与实践
35 胡大雷:传统文论的鉴赏式批评与今天的文学研究

多元话语

- 39 樊 星:恋母情结还是尊母心态
——漫谈当代男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
42 杨迎平:巴金的《复仇》及《现代·书评》
——兼谈巴金与施蛰存的文艺观
47 马明奎:割裂和异化:现代人的存在状态
——阿库乌雾神异世界和诡异思维释读之二
51 张志忠:阅读者—思想者系列形象的凸现
——什么是中国经验中国思想

54 李京潞: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之辩证观

地缘视野

- 59 巫瑞书:越楚同俗探讨
65 张泽忠、胡宝华、吴鹏毅:澄明与敞开:侗族时空观与世界图式梳理
70 王志清:“借名制”——民间信仰在当代的生存策略
——烟台营子村关帝庙诞生的民族志
75 翟鹏玉:花神信仰与壮族社会性别实践范式
80 崔志强:对儿童游戏“跑花姑子”发生变迁的民俗学思考

学林争锋

82 杨 雨:传播学理论的运用对唐宋词研究的意义

语言论谭

- 86 黎曙光:对越汉语疑问句教学难点剖析
90 贺大卫:东兰壮族的《造天地经》
101 蒙元耀:壮语物量词的指代用法
105 周 翔:浅析阿美语数词的文化特征

新著评介

- 108 李俊锋:伟大的学术抱负:《生态艺术哲学》评介
112 吴周文:评徐治平专著《天涯芳草》

《百越论丛》编委会

主 任:容本镇
副 主 任:袁鼎生
委 员:韦树关 冯仲平 李启军
陆卓宁 陈金文 张泽忠
张晓勤 黄秉生 黄晓娟
蒙元耀

学术顾问:刘魁立 杨 义 周来祥
饶芃子 贺祥麟 袁世硕
童庆炳 戴庆夏

主 编:袁鼎生
执行主编:陆卓宁 黄晓娟
执行编辑:吕瑞荣 蓝芝同 马卫华

全球文化整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张稔穰

【摘要】 全球文化由多元并存而逐渐整合,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本文论述了文化整合的基本规律,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置于全球文化整合的语境之下,加强古今文学的贯通研究和中外比较研究,以更好地在全球文化整合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 文化整合 古今贯通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一、全球文化由多元而整合的必然趋势

全球文化多元并存,这是当前不争的事实。而且愈是上溯人类历史,文化之“元”也就愈加纷杂。就我国而言,先秦时期,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泾渭分明;就一个较小的地域而言,比如现在山东省这一地域,先秦时期也有齐文化与鲁文化之别。这可就汉族文化圈而言,若加上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之“元”就更加繁复了。盖因越是上溯历史,生产力水平愈是低下,人们交往愈是不便,正是地域的封闭性形成了文化的多元性,以至“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成为流传至今的俗语。

但文化的多元并存并不是凝固的现象,“文化整合”也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而且整合的速度是同生产力发展水平成正比的。就我国来说,先秦以后,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各地域文化逐渐融合,文化的地域特色逐渐减少。直至现在,所谓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齐文化与鲁文化,除了语音、饮食等物质性层面的文化因子尚有较大差异外,处于文化深层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主导的方面,早已基本趋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56个民族,有些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已在现实生活中消失。近几十年来,文化趋同的速度更快。各地域之间密切、方便的交往,广播、电视的普及,普通话的政策推广等,也将使目前尚存的方言、方音的差异逐渐消亡;使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虽然国家对它们实行的是保护性政策。

就全球而言,近200多年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西方文化以其蕴含的旺盛生命力,高屋建瓴般推向全球,已有数以百千计的民族语言、本土

文化在其冲击下消亡。

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科技“加速度”般地迅猛发展,相距天涯海角的五大洲变成一个“地球村”,全球范围内文化整合的速度也同样大大加快。这一事实,从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即可看得十分明显。由此可见,文化的多元化,是生产力落后、地域闭塞的产物,不是恒定的凝固的现象;由多元而逐渐整合,乃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将现有文化的多元状况长期地永远地维持下去,这只是一种愿望。在久远的将来,就像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地域文化逐渐融合为中华民族文化一样,全球文化被整合为少量的几种主流文化,甚至形成基本一体的地球文化,都是极有可能的。

二、文化整合的内在规律及中国学人应有的文化姿态

文化整合不是各种文化联合开设“股份公司”,它的比较自然也是比较合理的进程是:某些比较优良的适合人类相应发展阶段需求的文化,被拥有异质文化的其他地域、其他民族的人们自觉自愿地消化式地接受;这些比较优良的文化也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因子,从而形成以优良文化为主体的动态发展的新的文化。这种经过整合的文化,包含着原来的各种文化的优秀基因,或者说是有原有各种文化优秀基因的有机化合。我国历史上的文化整合,比较明显地体现出这一规律。先秦时期在齐鲁大地发展成熟起来的儒家文化,在后世自然而然地被其他地区的汉族人民和许多少数民族甚至一度曾经主宰中国大地的少数民族所认可、所接受,同时它也吸取了其他地域文化以至域外文化的有益营养,随时代而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从历史来看,文化整合也是分层级分阶段

的,先是较小地域内具有亲缘关系的异质较少的文化的整合,而后是不同地域的文化的整合,逐步进行,范围由小而大。

在文化整合过程中,有两种堪忧的现象。一是弱势文化的谄佞心理,有了这种心理,就会在强势文化面前自惭形秽,不分精华糟粕,一律趋之若鹜;二是强势文化的霸权主义,为一己之私利,或出于狂傲心态,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而排斥异己文化。在这两种心理基础上整合出来的文化,其结果之一是某种强势文化的膨胀,其固有的缺陷因得不到其他文化合理因素的矫正而可能恶性发展;其另一结果是其他文化的优秀基因的丧失,从而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

200多年来直至今天,世界上的强势文化无疑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化基础上、伴随着工业文明而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这种文化以个人为本位,它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桎梏中解放了个人,激发了人的自我实现的欲望和创造精神,因而至今仍有盎然生机,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正如所有的文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这种文化也带有两种与生俱来的病毒性基因。一是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作为这种文化的早期代言人,培根等人在工业革命之初便提出了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思想,它反映了人类从大自然中争得自由的愿望,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之后发展为人类为了永无止境的物质享受而对大自然的毫无节制的掠夺,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变成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随着这种文化的大面积普及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病毒基因逐步导致病症的出现,时至今日,它已严重破坏了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内部的和谐关系,并已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二是在处理人类内部关系上的竞争哲学。竞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但在多数情况下,竞争的倾向是利己而排他的,是重功利而轻道德的,在本质上疏离了“善”。它的恶性发展,导致了人与人之间、集团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等多层次的人类内部的尖锐对立,导致了强权政治、侵略战争。财富积累、商品生产、综合国力等各种竞争,又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毁灭性掠夺以及人和自然的对立。现在虽然很多人都认识到了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迫不及待,科技的发展也增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但多种层次、多种多样的竞争关系使人们欲罢不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和自然的关系。

这种文化痼疾,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因为它

缺乏历史承传的遏制这种痼疾发展的抗病基因。这和有些生物类似。前些年,全世界种植了多达150余万亩的某种优质水稻,而一场突发的水稻黄矮病席卷全球,这种优质水稻因缺乏抗黄矮病基因而大面积绝产。科学家们遍查了几万种种植水稻,但因为它们与这种优质水稻的亲缘关系太近,都不具备所需的抗病基因,最后在印度某一山谷找到了一株含有所需基因的野生水稻,才挽救并改善了面临厄运的这一优良水稻品种。与此类似,世界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了西方文明潜在的危机,如英国学者彼得·罗素曾说过:“我们可能生活在西方文明正在衰落的时期……它自己已经证明了它的不可持续性。”人类的生存危机“会导致西方文明的衰落,但这并不是人类的完结,有些土著可能会生存下来,最终,他们很可能会创造出未来文明,也许很可能比我们的文明要明智”^[1]。罗素对西方文明危机的评论可能过于偏激,但西方文化在充分发挥了它的历史作用之后已与未来人类发展的客观需求不完全适应;全球文化的整合不应是目前的强势文化消灭其他文化,而应是各种文化的优势互补,这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何种文化将在未来文化整合的各个阶段占据主体地位,这主要决定于它们适应人类需要的程度,是不以某种文化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根据上述认识,我们面对未来不可避免的各种文化的加速碰撞与整合,应采取什么态度,具有怎样的心态?

第一,我们要以其他民族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为参照物,反思、检讨我们自己的文化,汰除我们的文化痼疾,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长。第二,要以现阶段以及未来人类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及西方文化的弱点为参照,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优长,理直气壮地予以阐释、宣传,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全球文化的整合中去,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或者是夜郎自大,敝帚自珍,或者是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只是顶礼膜拜,不分良莠一概吸收,其结果只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滞、萎缩,或者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逐渐消亡,这不仅是国人的悲哀,也是全人类的损失。

三、全球文化整合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国民族文化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优秀文化之一,几千年来一直处在动态发展之中,两汉不同于先秦,唐代不同于两汉,现代文化不同于传统

文化。但正像一个人会保留着祖辈的基因一样,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也会在不断的修改、补充、丰富中代代相传。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具有当代世界意义的优秀基因,早已引起某些西方人士的瞩目,如德国学者卜松山说:“中国传统思想大体指儒、释、道三家。在中国,这三种世界观或宗教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尤其是十世纪后,中国人至少是知识分子在观念和实践上一般对三者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这样做不会被斥为异端,不会有被革出教门之虞,也不会被绑在焚烧异教徒的木柴堆上,如同中世纪的欧洲屡见不鲜的那样。单单这一世界观上的宽容性和包容性,就足以成为帮助我们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个积极因素。”^[2]在论及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时卜松山又说:“儒家思想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当然带有许多历史的污垢,但是它的巨大人文主义价值,却在今日具有不可忽视的世界性意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儒家的修身理论可以作为人们的座右铭和清醒剂。在冲突不断、战争此起彼伏的世界上,儒家的仁学思想也许值得发扬光大。在环境危机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强调儒家的‘天人合一’,或许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事实表明,儒家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乃是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宝贵财富。”^[3]这只是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世界意义的优秀基因远远不止这些,它必将在全球文化整合中作出巨大贡献。近年来我国政府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就已在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前和以后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必须置于全球文化融合的语境之下,以积极姿态,投入到未来全球新文化的建构中去。

我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几乎是它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对它的评论、研究,各种研究论著早已汗牛充栋。特别是近30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硕士生博士生的大量培养,古代文学教学、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古代文学研究论著更是铺天盖地,多如山积。文化研究、艺术研究、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宏观研究、文献整理与研究,无不从经典作家、作品扩展到三四流的作家、作品;文学史的编写已从综合史扩展为分体史、题材史、地域史、编年史,其规模从单卷本发展为多卷本甚至十数卷本。古代文学的各个角落几乎都已被纳入了研究的视野,以致硕士生博士生

们想找一个没有人研究过的选题都十分困难。这一方面表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繁荣,但是是否也表明了古代文学研究已面临困境?古代文学是一种已然的历史存在,可能还有一些作家、作品等待我们发掘,还有一些文献资料等待我们整理,我们仍然需要去做这些工作,但不能以此作为整个学界精力投入的主要方向。因为从理论上说,这些工作是有止境的,而且越到后来,上述方面可做的工作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研究工作也就难于走出面临的困境。就像进山淘宝,即使山再大,宝再多,也只能是越淘越少,而且愈到后来,付出的劳动代价和实际收获就越不成比例。

古代文学研究面临的困境,归根到底是由于它已是凝固的历史存在,而非正在生成的事物,是由它的不可再生性决定的。走出研究困境的根本方法,是把它由不可再生性资源变为可再生性资源。当然,这不可能是古代文学本身的再生,而是意义的再生。从全球文化整合的语境研究古代文学,不仅是积极投入全球文化整合、建构的需要,也可能是使其意义再生、走出困境的一条出路。

在全球文化整合的语境下研究古代文学,首先应继续研究那些优秀作品的艺术经验,挖掘其当代意义、世界意义。在这方面,不能“搁置名著”,不能把古人留下的所有文字包括文字垃圾都视作遗产,它的艺术经验主要蕴含在名著之中。这种研究,对象可以限于某个作家,某部作品,但胸中应有其他时代、其他民族文学艺术的广博知识,以之作为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作为研究时的参照物,从而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进行全新的观照。

在全球文化整合的语境下研究古代文学,应将其与现当代文学贯通一起,观照古代文学如何影响了现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如何继承了古代文学的基因,古代文学对现当代文学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它有哪些值得今天的创作继续借鉴的经验,以及经过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检验,它有哪些应当淘汰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为构建、繁荣当代新文化新文学服务,使之更好地参与全球文化的整合。

在全球文化整合的语境下研究古代文学,还应进行中外比较研究。从比较中更好地认识古代文学蕴含的恒久的具有全人类意义的积极因素,它的痼疾和不足,它为未来的全球文化建构所可能作出的贡献。

大自然中的每一种元素,如果将其孤立起来看,其性状都是简单的,有限的。但如果令其和其

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研究刍议

——以宋代士风与词史流程为例

□张再林

【摘要】 我们现在所研究、建构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学史。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国古代士风的研究。士风的内涵是指一定时代环境中的士大夫文人的思想特质和行为习惯;而它的外延还指向整个士人的生存领域,包括他们的全部精神性、心理性表现及其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士风”有其发展的一贯性,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又常常显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并深刻影响到文学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独特艺术景观的形成。宋代士风最显著的特征是士人往往集“官僚”、“学者”与“才子”于一身,这直接促成了宋词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关键词】 士风 文学 宋代 词史流程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一、“士风”的内涵与外延

我们现在所研究、建构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从作者的身份和地位来说,实际上是一部中国古代士人(或称文人、知识分子)的文学史(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有关民间文学的介绍,而其实保存至今的民间文学大都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关注中国古代士人的思想观念、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审美心理、生活情趣等等,这些属于“士风”方面的内容。那么,究竟何谓“士风”?如何确定它的内涵和外延?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古代的士人对

士风的有关论述。

北宋王辟之在谈到宋初科举考试的风气时云:

国初袭唐末士风,举子见先达,先通笺刺,谓之请见。既与之见,他日再投启事,谓之谢见。又数日,再投启事,谓之温卷。或先达以书谢,或有称誉,即别裁启事,委曲叙谢,更求一见。当时举子之于先达者,其礼如此之恭。近岁举子不复行此礼,而亦鲜有上官延誉后进者。(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九。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而南宋罗大经在谈到当时士林的风气时云:

盖至于今,士非尧、舜、文王、周、孔不谈,非

他元素发生关系,进行碰撞、化合,就会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千世界。古代文学也类似于此。把它孤立起来进行封闭式研究,它只能是一座死的矿山,总有开掘净尽的一天,而且研究成果也游离于现实的需要。若把它同现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联系起来,放在全球文化整合的语境之下,它就会成为有生命的处于生成状态的对象,而且随着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它的意义也会处在恒久的动态的生成之中;这样的研究也才能融入现实生活,受到现实的关注和欢迎。

在全球文化整合的语境下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无疑具有了更大的难度。它要求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融汇古今,贯通中西。老一辈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早已对学者提出这一要

求,当年轻一代学人应朝这一方向努力,努力开拓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转引自詹克明.保护“诺亚方舟”.光明日报出版社.书摘.2004年第6期,第36页.
- [2]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中华书局2000年10月版,第24页.
- [3]同上,第34页.

【作者简介】 张稔穰,男,1940年生,山东巨野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山东曲阜,邮政编码:273165。

《语》、《孟》、《中庸》、《大学》不观，言必称周、程、张、朱，学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后所未有也，可谓盛矣。然豪杰之士不出，礼义之俗不成，士风日陋于一日，人才岁衰于一岁，而学校之所讲，逢掖之所谈，几有若屠儿之礼佛，娼家之读礼者，是可叹也。（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五）

不难看出，王辟之所言之“士风”，是指某一时期士人在某件具体事情上的普遍行为；罗大经所言之“士风”，则是指某一时期士人群体在思想和行为上的综合表现。而从这两段话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士风”还应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具有阶段性的特点。

古人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理解“士风”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很好的启示。然而，我们今天来研究这个问题，却又不能仅仅囿于古人的认识，而应有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更为深邃的历史眼光。

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曾对“士风”这一概念作过这样的阐释：

所谓士风，牵涉到两个截然不可划分的方面，一是知识分子（当时称之为“士”或“士大夫”）的思想，一是他们的行为。（《士与中国文化》）

余先生的阐释简洁明确，与古人有关“士风”的认识也颇为相符。2004年9月17日至20日，在武汉召开了由中南民族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士风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有学者提出，“士风”的概念是指一个时代的士人（知识分子）的普遍行事方式、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包含普遍士风、块团士风以及个人士风三个层面^①。

时贤的这些意见虽皆大体可以成立，但又都还有失于简略之处。笔者以为，“士风”这一概念，其内涵是指一定时代环境中的士大夫文人的思想特质和行为习惯；而它的外延还指向整个士人的生存领域，包括他们的全部精神性、心理性表现及其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而只有持这样动态、通达的观念，我们才能以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全面地审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行为，正确地理解士风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把握中国古代社会士风发展的一贯性和阶段性特征，从而更好地揭示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概说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士风”有其发展

的一贯性，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又常常显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金人刘祁在论前朝盛衰之迹时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

窃尝考自古士风之变，系国家长短存亡……唐兴，士大夫复以事业功名为上，贞观诸人有两汉风，其权谋、经术、文章、名节者错出间立，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国势亦至三百载。及其乱也，死节者相望。五代之间亦无可取。宋初，士大夫复驰骋智谋。厥后混一，其风大变，经术、文章不减汉、唐，名节之士继踵而出。大抵天下乱，则士大夫多尚权谋、智术，以功业为先；天下治，则士大夫多尚经术、文章、学问，以名节为上。国家存亡长短随之，亦其势然也。（《归潜志》卷十三）

刘祁在此谈论的虽然是士风与国家“长短存亡”的关系，但这种具有明显阶段性的风气无疑也会对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刘勰在推求历代文学衍变的原因时就曾得出过“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②的重要认识；近代文论家刘永济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则标举“风会”之说：

文艺之事，言派别，不如言风会。派别近私，风会则公也。言派别，则主于一二人，易生门户之争；言风会，则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制之因革，皆与有关焉。盖风会之成，常因缘此三事，故其变也，亦非一二人偶尔所能为。（《词论》卷上）

而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丹纳则强调要研究影响艺术（文学）变化的“精神气候”：

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我们研究自然界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植物的出现……同样我们应当研究精神上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艺术的出现。（《艺术哲学》）

按照我们的理解，刘勰讲的“世情”、“时序”，刘永济讲的“风会”以及丹纳讲的“精神气候”都可以统一于“时代风气”这一概念。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统治思想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层）的思想。士人作为中国封建统治集团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身上最显著地体现着时代的风气或“精神气候”。“夫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赞扬其风，系卿士大夫也，卿士大夫何尝不出于士乎？……四人之业，士最关风化”^③；“风俗者，治

忽之枢机；士大夫者，风俗之权舆”^[4]；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时代风气”与“士风”其实是两个可以等同的概念；而时代风气又会影响到文学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独特艺术景观的形成。举例来说，魏晋时期，汉代的经学被玄学取代，士人突破了传统礼教的藩篱而形成了一种“任诞”的风气，由此影响到文学创作，就形成了魏晋文学那种特有的萧散简远，清虚高旷的风貌。再如，宋人多认为唐末五代文学的衰竭是与当时士风的状况息息相关的，如杨亿云：“文章随时风美恶，咸通已后，文力衰弱，无复气格。”^[5]黄伯思云：“五季道衰文丧，当时操笔牍士，率皆哇俚浅下，乱杂无章。”^[6]而南宋周必大则将北宋仁宗至和至哲宗元符五六十一年间文章的发展历程归结为士风变化的影响：

至和、嘉祐中，文章尔雅，议论平正，本朝极盛时也。一变而至熙宁、元丰，以经术相高，以才能相尚，回视前日，不无醇疵之辨焉。再变而至元祐，虽辟专门之学，开众正之路，然议论不齐。由兹而起，又一变为绍圣、元符，则势有所激矣。盖五六十年间，士风学术无虑四变，得于此必失于彼，用于前必黜于后。一时豪杰之士有不能免，况余人乎？（周必大《苏魏公文集后序》）

而反过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又可以说是士风的一种必然表现——南宋留正即曾有言：“太学时文，四方视以为法，而士风厚薄，人材盛衰，皆可概见于此。”^[7]而清代词评家贺裳亦言“词虽小道，亦见世风之升降”^[8]。

由上可见，对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之间动态关系的探讨，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开拓的研究领域。下面我们将以宋代士风对词之发展的影响为例，对这一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宋代士风与词史流程

宋代士风最显著的特征是士人往往集“官僚”、“学者”与“才子”于一身，这直接促成了宋词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赵宋王朝代表的是庶族地主的利益，魏晋以来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的士族阶层至此已基本消亡，豪门大族把持仕途、压制孤寒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展现在士人面前的是一条可以凭真才实学跻身统治集团的光明坦途。加之宋朝实行优待士大夫的政策，不仅广开进取之途，且给赐优裕，故宋人孔平仲有“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9]之言。而清人赵翼也在详尽考察了宋朝优待士大夫的各种政策、事例之后，进一步总结说“（宋代）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10]。“寒儒逢景运，报德

合如何？”宋仁宗在景祐元年赐给及第进士的这两句诗正反映出了当时庶族士子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历史机遇^[11]。这种形势自然会激起士人奋发攻读，以求科第及名、入仕为官的强烈愿望。“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补之《夜行》），“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欧阳修《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这样的诗句正是当时广大士人刻苦用功、角逐试场情形的生动反映。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即由此进入政府机构，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可以一直进入到行政的中枢。如曾经担任过宰相的欧阳修、王安石都同时又是当时最为出色的学者。苏轼虽未曾为相，但也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他们既是朝中重臣，同时又是文学家、经学家、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正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言：“在历代大帝国中，宋是文化性最强的一个”，宋代的官僚很少有“不会做诗，不能谈论哲学的”^[12]。在北宋士人的人格观念中，“官僚”与“学者”就是这样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除“官僚”与“学者”的一面之外，宋代士风中“才子”的一面也很突出，它的形成大约始于宋真宗时期，而此时正是宋代社会奢逸享乐之风开始抬头之际。至宋真宗时，由于承平日久，国家开始呈现出繁荣的气象，宋代社会的享乐之风也由此渐长。宋人王楙总结宋代社会风气的变化过程说：“祖宗立国之初，崇尚俭素，金银为服用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按：此皆为真宗时事），而侈费浸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咸平、景德（按：二者皆为真宗年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13]。再者，赵宋朝廷实行的优待文士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宴游享乐之风。宋太祖在开国后不久所采取的“杯酒释兵权”策略，其中就含有倡导人们追求娱乐享受的人生观的意思，并对词的繁盛有“促发之功”^[14]。

词至北宋真宗、仁宗两世，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而决定着这种发展格局的，正是士人集“官僚、学者、才子”于一身的特点。由于相对“才子”的一面而言，宋代士风中“官僚”与“学者”的联系更为紧密，所以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也就把二者放在一起谈。以下即对这两方面的情况作一简要分析。

先说“才子”。宋代的重要词家几乎无一不是

才情富丽、风流俊赏的“才子”。比如,宰相词人晏殊曾向张先说自己对人生所持的态度是“人生行乐耳”^[19],而他确实也过着“未尝一日不燕饮……亦必以歌乐相佐”^[19]的生活,他的很多词就是诞生于这样的歌筵酒席之上的。而张先对晏殊之言看来也是“别有会心”的,他到了85岁时还在忙着买妾,以至苏轼跟他开玩笑说“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今作诗》)。而曾官至宰相、又身为宋代诗文革新领袖的欧阳修则与苏轼一起被认为是宋代“最浪漫”的两位士人^[17]。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年仅24岁的欧阳修出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他在洛阳任职期间,遍游嵩岳名胜,与钱惟演、梅尧臣、尹洙等文士“游饮无节”,并自号“达老”。后来梅尧臣在作诗回忆这段生活时还曾有“山东腐儒漫侧目,洛下才子争归趋”(《四月十七日与王正仲饮》)之言。而欧阳修的填词活动正是从洛阳期间的这段诗酒放达的浪漫生活开始的。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认为:“欧阳修词中如《玉楼春》(‘春山敛黛低歌扇’、‘尊前拟把归期说’、‘洛阳正值芳菲节’、‘常忆洛阳风景媚’),《夜行船》(忆昔西都欢纵)等都是写这段生活的”,并进一步推论说:“某些艳词很可能作于此时”,综合考察词在北宋初期的创作环境及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创作活动,此推论当可成立。由上足见宋代士风中“才子”的一面对词之发展的巨大影响。

再说“官僚、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中曾对宋初士风的变化情况做过一番总结,他说: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

而在宋代首先为词的发展注入一股新风的,正是来自这批宋世士风丕变的倡导者。王禹偁和范仲淹开始在词中抒写自己的仕宦之感。王禹偁的《点绛唇》(雨恨云愁)以清丽的笔触描写江南雨景,作者用世的抱负以及不被人理解的孤独愁闷隐约流露其间;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则“颇述边镇之劳苦”^[19],边地前线的紧张气氛,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都于词中可见。这种仕宦之感在欧阳修的词中也多有反映,如“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圣无忧》)、“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临江仙》)、“浮世歌

欢真易失,宦途离合信难期”(《浣溪沙》)等等,都是他作为一位政治家俯仰身世、兴怀沉浮的仕途经历的表现。这批宋世士风丕变的倡导者,同时又是著名的学者,他们开始在词中发表议论,抒写对世事、人生的态度和看法,融入自己的学识襟怀、修养情趣。如寇准的《阳关引》(塞草烟光阔)、范仲淹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张昇的《满江红》(无利无名)、《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以及欧阳修的《朝中措》(平山阑槛倚晴空)、《浪淘沙》(把酒祝东风)等都是如此。上述诸端都显露出词的发展正在由晚唐、五代以来较为单纯的“才子”、“浪子”之词而向复合型的“官僚、学者”之词的多元化方向过渡的新动向。

另外,为宋词的多元化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的还有张先、晏殊、宋祁、王安石等人。张先开始大量用词来赠别酬唱,将词逐渐引入士人的社交场合,这就扩大了词的实用功能。而晏殊的突出之处是他在词中注入了对人生的理性思考,而且“写富贵而不鄙俗,写艳情而不纤佻”^[19]。“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栏干影入凉波”(《浣溪纱》)、“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采桑子》)……这些词句皆所谓不言金玉而自有富贵气象,表现伤感却又放旷通达者。宋祁今存词虽然不多,但也都如时人李之仪所评那样,显得“风流闲雅,超出意表”^[20]。王安石虽不以词著称,但其所作却自具风貌。其词绝少艳辞丽句、儿女情志,多咏史怀古乃至谈禅论道之作。其《浪淘沙令》通过对商周时代著名政治家伊尹、吕尚的遭逢明主、建功立业的咏写,寄托自己推行变法的勇气和决心:“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亡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工!”而《诉衷情》则流露出了变法失败后的忧愤不平之感:“追思往昔如梦,华毂也曾丹……达如周召,穷似丘轲,只个山山。”刘熙载说“王半山词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21],是符合王安石词的实际的。

继王、范、晏、欧等人之后,为词的多元化发展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的,还得说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文人的典型代表人物苏轼。历来有关苏轼对词的贡献之论多矣,笔者以为,这种种意见归结到一点,即是苏轼基本完成了对词的风貌的改造,从而最终为词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词论家陈廷焯言苏词胜于其诗文,为“此老平生第一绝诣”^[22],盖即着眼于此。而杨海明先生则指出:“只有到了苏词,‘词品’才和‘人品’基本上对上了号”^[23]。因此,苏词的引

人入胜之处即在于它比较全面和真实地展示了作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标本”的苏轼的人格魅力。苏轼兼儒、佛、道、纵横诸家与贤臣循吏、风流才子于一身,他一生的行为处事无不表现出这种特点。比如,苏轼在杭州时,一面招募饥民重修六井,浚湖筑堤,“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命之为苏公堤”^[24]。同时又谈禅访道,且“倚翠偎红,艳史尤多”^[25]。

苏轼这种集官僚、学者、才子于一身的人格特点反映在他的词中,于是就有了抒发报国情怀的《江神子》(密州出猎)、感叹功名不竟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揭示仕隐矛盾的《沁园春》(孤馆灯青)、《满江红·怀子由作》、表现旷达处世态度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谈禅论道的《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及自净方能净彼),还有产生于歌宴酒席之上、游戏笔墨的《减字木兰花》(郑庄好客)、《西江月》(照野瀰瀰浅浪)、《木兰花令·次马中玉韵》、《渔家傲》(千古龙蟠并虎踞)、《戚氏》(玉龟山)、《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等。苏轼的这一番改造将词最终引上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正所谓“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26]。由此,词与诗一样成为人们抒情言志的工具乃至反抗斗争的武器就有了可能,它发展的基本格局也就由此而大体得以确定。

以上我们简要描述了宋代士风对词之发展的影响,由此一例即可看出,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这一研究领域蕴涵着丰富的内容。而从士风的角度审视古代文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出许多新的认识,相信必会有人乐意朝这方面努力。

【参考文献】

- [1] 石麟. “士风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6期.
- [2]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 第47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3] 刘昉. 旧唐书. 卷一百一十九, 中华书局, 1975.
- [4] 佚名.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 卷四, 中华书局, 1995.
- [5] 杨亿. 杨文公谈苑.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6] 黄伯思. 东观余论. 卷下. 宋人诗话外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
- [7] 苗书梅等点校. 宋会要辑稿·崇儒. 第55页,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8] 贺裳. 皱水轩词筌. 词话丛编. 中华书局, 1996.
- [9] 孔平仲. 孔氏杂说. 卷二. 笔记小说大观. (台北)新

兴书局有限公司, 1984.

- [10] 赵翼. 廿二史劄记. 卷二十五, 中华书局, 1963.
- [11] 阮阅. 诗话总龟. 卷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12] 吉川幸次郎. 宋元明诗概说. 李庆等译, 第7页,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 [13] 王楙. 燕翼诒谋录. 卷二, 中华书局, 1981.
- [14] 刘扬忠. 唐宋词流派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 [15] 王暉. 道山清话. 笔记小说大观. (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 1984.
- [16] 叶梦得. 避暑录话.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7] 王书奴. 中国娼妓史. 第89页, 岳麓书社, 1998.
- [18] 魏泰. 东轩笔录. 卷十一, 中华书局, 1983.
- [19] 叶嘉莹. 迦陵论词丛稿. 第48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20] 李之仪. 跋吴思道小词. 姑溪居士集. 卷四十, 宣统三年金陵督粮道署刊本.
- [21] 刘熙载. 词概. 词话丛编. 本, 中华书局, 1996.
- [22] 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 卷七. 词话丛编. 中华书局, 1996.
- [23] 杨海明. 唐宋词史. 第330页,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 [24] 脱脱等. 宋史. 卷三三八, 中华书局, 1977.
- [25] 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余. 卷十, 中华书局, 1956.
- [26] 王灼. 碧鸡漫志. 卷二. 词话丛编. 中华书局, 1996.

【作者简介】 张再林, 男, 1973年生, 湖南永州人, 广西师范学院研究生处副处长、教授。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广西南宁, 邮政编码: 530001。



从汤式散曲看元末明初下层士人的思想和生活

□陆凌霄

【摘要】 汤式散曲内容广泛,比较清楚地反映出元末明初下层士人的思想和生活风貌及儒、道、佛三家思想对士人的影响,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从中也可以总结出封建时代士人的一些人生教训。

【关键词】 汤式散曲 下层士人 思想生活 人生教训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汤式散曲见于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本),有套曲66套,小令160多首,内容广泛。汤式在明史中无记载。据《全元散曲》介绍,汤式字舜民,号菊庄,元末象山人,落魄江湖间。明成祖在燕邸时,遇之甚厚,永乐间赏赉常及。补本县吏,非其志也。好滑稽,所作乐府套数小令极多,名《笔花集》。语多工巧,江湖盛传之。著杂剧二种:《瑞仙亭》、《娇红记》。今俱不传。从这些介绍中了解到,汤式虽然与明成祖有过交往,但除了以候补得到本县县吏之外,再没有得过别的官职。县吏固“非其志”,其性又比较滑稽,所以尽管有一定的才华,始终未得重用。终其一生,无非做些散曲,写些剧本,抒发失意的苦闷。这在元末明初的下层士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散曲,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一时期下层士人的思想和生活风貌。

一、对仕途的憧憬、期待与幻灭

士人阶层多数出身寒微,隋唐以来,士人虽然可以通过应试求得仕进,但能够通过这一途径获得成功的毕竟很少。元代末年,天下大乱,士人隐居者多。虽然朱元璋做吴王时就开科取士,但世乱已久,科举起初也只局限于江南一带。后来虽局势稍定,但朱元璋死后不久,朱棣便发动了战争,从惠帝朱允炆手里夺取了政权。汤式在《出对子·题酒色财气四首》之四中,借刘项“图王争帝,半乾坤心未已”,暗指叔侄争帝一事。由于战乱,这一时期的士人生活不太安定。士人想进身,要走的一条路就是依托权门,求取官职,汤式当时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子。从他的作品中知道,他到过北京,并且待过相当长的时间,这期间主要来往于教坊勾栏,这在他的散曲中多有反映。明成祖新建教坊落成,汤式写了一篇题为《新建构栏教坊求赞》的散曲,开头“圣遍飞龙当日,火精焰焰光天德。三尺剑一

戎衣,笑谈间平吞了万里华夷”,对明成祖平定南北一事作了歌颂,并叙写了教坊的兴建及演出的情景。这个散套可以作为他与夺取了帝位的明成祖有交往的证据。但后来明成祖给了他什么职位,没有史料记载,可能是简介中说的给他补了个本县的县吏。

汤式散曲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于仕途充满了幻想,如《送人应聘》中描述了帝都的壮丽,勉励朋友及时应聘,从中也反映他求官的心态。“整顿着千尺丝纶一寸钩,笑谈间钓出鳌头。莫迟留,壮志应酬。不负平生经济手,稳情取金花玉酒,银章紫绶,教人道‘凤凰台上凤凰游’。”汤式认为只要有满腹经纶,就可以登台阁,干大事,这一点很像盛唐时的李白。开始时汤式对仕宦是充满信心的,如《赠人》:“麒麟阁上臣,虎豹关中将,名高金殿客,贵压紫薇郎。玉立昂昂,捧日月光天象,保山河壮帝乡。紫金梁稳架沧溟,白玉柱高擎庙堂。”他甚至憧憬着出将入相的情形:“巍巍九鼎臣,落落三台位;飘飘七步才,密密五兵机。门第相辉,俯仰谐天意,经纶合圣规。书架插三万旧日牙签,武库列十二清霜画戟。……金瓯应已藏名讳,麟阁终当绘像仪。寄语公明董狐笔,比及待论功赐邑,铭彝勒石,先筑沙堤四十里。”这未免带有书生气,但封建时代的士子受儒家思想影响,多数人在读书期间就有许多美丽的幻想。孔子说过“学矣,禄在其中矣”,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宋朝以来也流传着这样的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据说宋真宗还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意”这类勉励士子的话,这给读书人平添了许多对于未来前途的想象。汤式的《赠人》曲颇为生动地反映了读书人的心理:“心怀雨露恩,气禀乾坤秀。读书尊孔孟,许国重伊周。得志之秋,文共武皆穷究,正青春正黑头。孙吴略切切于心,齐鲁论孜孜在口。……烟消青海

城边堠，兵洗黄河天上流，庆祝皇图万年寿。蛮夷殄收，戎狄遁走，恁时节描人麒麟画工手。”“汪汪江海心，落落云霄志。昂昂经济才，矫矫廊庙姿。阃外行司，暂把牛刀试，播芳声雷贯耳。……烽烟息朝廷有道，簿书闲公馆无私。笑谈间唤得春风至。……于亲已足平生志，许国应当少壮时，显孝扬忠但如是。抱金曳紫，承恩奉旨，稳情取勋业班班照青史。”做个忠臣良将，显姓扬名，垂辉千秋，这是古代读书人常有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汤式有几首《赠人》，不着姓名，一看就知道是借以自述。但这种空手套白狼式的幻想毕竟是书生们的一厢情愿，很难得到统治者的赏识。汤式很久没有得一官半职，依旧在教坊里混着，因此开始变得焦虑起来，《言志》一曲就表露了他的焦躁：“自怜王粲狂，莫怪陈登傲；不弹贡禹冠，谁赠吕虔刀。十载青袍，况值烟尘闹，事无成人半老。黄金台将丧斯文，白玉堂空怀故交。[梁州]看鞍马上诸公袞袞，听刀戈下众口嗷嗷。因此上五云迷却长安道。曳裾休叹，投笔空焦；题桥漫逞，击楫徒劳。直钩儿怎钓鲸鳌，闷弓儿难射鹏雕。喜的是砚池内通流着千丈沧溟，诗卷里包藏着九重宣诏，书楼上接连着万里云霄。虽道是浅识寡学。这几篇齐鲁论也不下于黄公略，捻吟髭自含笑。矫首中天日正高，豪气飘飘。[尾声]闲拈斑管学张草，静对黄花诵楚骚。等待新雁儿来时间个音耗；若说道董仲舒入朝，公孙弘见招，看平地风雷奋头角。”《言志》虽然焦虑，但依然相当自负。他引述了一批先是失意后来显赫的历史人物作宽慰，无非是认为天生我才，何愁没有“平地风雷奋头角”的时候？但长时间等待之后，他终于忍不住了，在《和陆进之》中，愤懑、无奈溢于言表：“得峥嵘我怎不峥嵘？倦懵懂咱非真懵懂，要知重人越不知重。嘻嘻冷笑中，叹纷纷眼底儿童。莫听伤时话，休谈盖世功，愁对东风。守书窗何日离书窗，瞻玉堂何时步玉堂，避风浪何处无风浪。浮生空自忙，赋登楼醉墨淋浪。怨花柳春三月，误功名纸半张，愁对斜阳。使聪明休使小聪明，学志诚休学假志诚，秉情性休乔真情性。江湖已半生，伤心一事无成。物换人非旧，时乖道不行，愁对书灯。守清贫随分清贫，求荐人何方可荐人？说聪俊谁肯怜聪俊？儒冠多误身，谩夸谈子曰诗云。黑鬓三分雪，貂裘一寸尘，愁对芳樽。”他终于像当年杜甫那样感觉到“儒冠多误身”，开始产生了幻灭感。值得注意的是，汤式多用套曲来表达对仕途的渴望，既可以充分地表达心愿，也可以一展才华。但他有时也用小令，如[中吕]《山坡羊·书怀示友

人》四首就反映出在离家求官期间遇到的“世道炎凉”、“任人揶揄”、“人情浇诈”，及“田园荒废”，耽误生计的复杂心情。

士人失意，原因颇多，共同之点是往往才气有余而才干不足。朝廷需要的是有才干的人，以处理日常政务，耽于幻想并且自负的士人，是很难被看中的。汤式中年时才补了个本县县吏，就是统治者对他的打发。从汤式对于仕途的热烈憧憬、漫长期待、到最后幻灭的经历中，不难看到元末明初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这也可以看做是那个时代下层士人求仕经历的忠实记录。

二、歌妓、怀古与田园

1. 与歌妓的交往

汤式散曲中有许多赠歌妓的曲子，大约作于逗留北京期间。这应该跟他的性格及仕途失意有关。元明时期，读书人中有才华的，如果仕途不顺，另一条路就是写点杂剧散曲，敷衍生活。既难得显于官场，只好混迹于教坊剧院，或隐居于乡间，汤式也是这么一种情况。从作品来看，他所交往的歌妓，有素云、素梅、明时秀、展香绵、薛琼琼、玉芝春、素蟾、佛奴、王观音奴、王善才等。文人多情，六朝以来，酒楼妓院多为文人混迹场所，一方面歌女们的确能够诱惑不少文人，这在唐传奇中多有反映。另一方面文人依声填词，成为歌妓新词的主要来源，通过文人的描摹，歌女提高了身价；而歌女的传唱，可以扩大文人的声誉。歌女与文人，似乎是水火既济，互相依靠，不可或缺的。试看汤式的《赠妓素兰》：“散清风烟月中，逞素质风尘内，染一枝春色淡，攒两叶翠痕低。束具含犀，另一种风流意，比群芳分外奇。俏如荪名重秦楼，娇似芷声扬楚国。[梁州]天滴下仙葩圣卉，世修来雪骨冰肌。等闲谁许问容易。玉盘儿生长，锦窠儿栽培。影双双连理，叶小小菩提。幽斋结珮相宜，赏兰亭修禊闲题。胭脂瓣洗渲净天香，金花粉调和成玉蕊，素檀心抽拣出柔荑。巧移，俏植。舞蹲一捻腰肢细，解人意。笑杀春风不敢吹。种种相宜。[尾声]并头莲合欢草多清致，如意朵珊瑚枝有价值，瘦影清香足风味。海棠娇莫比，芙蓉色怎及？雪窗下玲珑镜儿里。”此曲细致刻画了素兰的素雅、风流和善解人意。文人的笔墨，确实能够提高歌女的身价。

与妓女的交往，也会有许多难言痛苦，或染一身病，或造下恶缘，引起懊恼等，这是常有的事，《春闺即事》就反映这类情况：“病也斜恰似醉也斜，身瘦怯那堪影瘦怯，人薄劣何况情薄劣。好